



马小峰

引领「区块链+创新」健康发展

区块链是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一种普适性的底层技术框架。区块链并非单一、全新的技术,而是基于密码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分布式计算、运筹学、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与测试、系统工程等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技术创新。

简单来说,区块链利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来存储与验证数据,利用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脚本代码(智能合约)来自动化操作数据。由此,它可以在节点无须互相信任的网络中实现可信的、去中介的点对点交易与协作,从而有助于解决互联网上信任与价值的可靠传递难题。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在我国,长三角在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创新领域拥有良好基础。中央网信办公布的506个通过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的项目中,长三角拥有160项(上海市72项,浙江省59项,江苏省26项,安徽省3项)。

同时,区块链技术在社会治理、普惠金融、供应链管理、航运物流、数字金融、智慧司法、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得以应用,一批引领全国的示范性应用在长三角集聚。

具体来看,上海区块链联盟数量全国第一,具有“技术+资本+场景”的生态优势;浙江杭州是国内区块链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拥有丰富的“区块链+产业”应用场景。

面向未来,区块链已经超越技术本身,有可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对长三角而言,应当进一步发挥技术、人才、产业和金融资源上的优势,强化协同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努力成为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一要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坚持走原始创新道路。

现实中,还存在使用国外开源代码库来修改的所谓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底层技术系统。这些系统有不少知识产权隐患,而且技术发展路径不可控,面临“卡脖子”的危险。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发挥长三角高校和科技公司的理论、技术研发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产业机构的合作,共同加大对相关理论研究、核心技术研发、落地场景验证和应用的支持力度,打造长三角自主、开放、可控的技术研发生态社区。

二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例如,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问题,中小企业“信用不过关”,也没有什么可用于担保的资产,加之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实际经营信息难以对称共享,导致金融机构在提供融资服务的时候“畏手畏脚”。

区块链的发展,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共享度,有助于简化业务模式、降低信任成本,给供应链多方创造可信平台,进而实现利益共享、多方共赢。

三要加强对区块链应用风险的分析和防范。区块链技术会赋能很多应用创新,提高社会效率,但也会创造“虚拟货币”“空气币”等不合规的、对社会破坏力大的应用,且隐蔽性极强。同时,区块链技术发展历史较短,其两面性容易被投机诈骗分子钻空子。

除了备案制以外,建议实现穿透式监管,推动“区块链+创新”健康稳定发展。例如,在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帮助下,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设立区块链节点来随时检查,从而摆脱对传统飞行检查的依赖。

四要加强对人才培养。据统计,到2020年,区块链、机器人和新材料等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底层建设,如果缺乏人才支撑,将受到极大的约束。对长三角而言,有必要依托高校资源优势,更多地开设区块链人才培养相关课程,探索区块链技术创新培训体系,继而成为区块链领域的人才培养高地。

(作者为上海区块链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

理论动态

推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

日前,“2019年上海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推进会暨全媒体背景下新时代师德师风传播高端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会上,全国首家师德专业网站——“师德网”正式开通。

该网以服务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为宗旨,设有“上海师德师风特色”“全国师德建设经验”“国外师德建设镜鉴”“师德警示”以及“校长关注”“教师声音”“学生发言”“家长视角”“专家评论”等栏目;不仅有中外思想家、教育家论师德的名人名言,也有深受广大教师和师范生欢迎的优秀师德影视、艺术作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师德师风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来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60余人与会。(李文静 王珍)

聚焦社区建设和治理创新

由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19年会员大会暨“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前瞻”研讨会,日前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

本次研讨会是上海市社联第十三届“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之一,聚焦近年来上海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理论、实践进展与瓶颈问题,并就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方向、路径进行探讨。

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党建研究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上海社区治理的回顾与展望、城市精细化管理、垃圾分类与基层治理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等主题进行交流。来自虹梅路街道、康健新村街道、静安寺街道的社区治理者介绍了来自一线的创新探索。(叶月萍)

“三个历史”昭示救国兴国强国路



杨俊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远扛在肩”。这“三个历史”揭示的基本结论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起房子,要几十年工夫”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近代以来,时代出的试卷就是在亡国灭种的民族总体性危机和传统文明衰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国情和历史主题下,以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的必然要求和生动体现。整部中共党史,就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就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三个历史”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体现在这一历史主题和主流之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初心使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再经过艰苦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第二步。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比喻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个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如果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整部中共党史,就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就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三个历史”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体现在这一历史主题和主流之中

看准了认定了,就走下去

从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三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主要形成了四个基本历史结论:

第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的本质,内在决定了党的领导地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里的“开天辟地”在于从此找到了能够正确领导社会变革、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先进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信念和奋斗目标都体现在党的奋斗过程之中,党的理论和自身建设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党史承载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光荣传统。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会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迅速取得,而需要通过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在工农武装割据区域,通过了由党直接领导一切的原则和模式。党通过党的委员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一大基石,即“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改革开放新时期,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四梁八柱”就是这些根本政治根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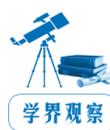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和目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得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必然归宿于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具有独创性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

为何要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

姚晓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后,关于如何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实现并强化党的领导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实务界的操作难点。

有人提出,“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与改革开放前的状况有何区别?公司治理概念和制度作为“舶来品”,在将党的领导嵌入其中后是否会引起制度内部的冲突,从而降低制度绩效呢?

对于这些疑问,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必须给予明确的正面回应,从而直气壮、一以贯之地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真正发挥党的领导对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事实上,道理越辩越明。当各方存在不同观点且争执不下时,往往是源于对事物本质缺乏深刻、全面的认识。仅仅抓住“大象”局部而误以为真理,自然得不出能让人普遍信服的结论。即使各方有所妥协,也恐怕是“扬汤止沸”。要真正做到“釜底抽薪”,需要在更加宏大的时空观下,认清事物的本源和意义,从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出发,结合现实条件,辨析优劣对错。

国有企业制度是主动追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力,就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生产力形态以人力劳作、农业为主,以人身依附为特征,这决定了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必然以土地为载体,土地制度成为自然经济生产关系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生产力形态以机器生产、专业分工、自由雇佣为特征,这决定了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必然以企业为载体,即企业制度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商品经济阶段,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基本规律的必然结果。

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生活中,本质上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个别企业生产力的提升反而会造

社会生产力破坏。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悖论”导致的“合成谬误”。

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围绕解决这一“内在悖论”,试图构建一套能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如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在理论设想中,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在面临企业个体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冲突时,会以社会生产力最大化为行为原则,具体表现为服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始终是为了更好发挥国有企业作用

国有企业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悖论”而作出的制度创新,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始终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具体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要求自然也会不同。准确把握不同之处,就要弄清楚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改革的深层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制度存在交易成本,如发现交易对象、谈判及督促契约履行等费用。同时,企业存在管理成本,如不同部门协作、股东对管理层监督、管理层对员工激励等费用。而且,随着企业的扩张,管理费用具有加速上升的边际效应。

在历史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尝试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企业”。由于边际效应,“超级企业”的管理费用远大于其节省的市场交易费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力潜能受到抑制。由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悖论”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降低经济体系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公有制主体。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得以避免经济发展的“合成谬误”。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大致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生产车间”,按照上级计划指令进行生产运作,党组织对企业运行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予以全方位掌控。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具体微观层面必须与市场经济基

发展,保障了民族独立和基本民生,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剧烈贫富分化、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命脉被外国控制等问题,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各方面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我们在短时间内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党的八大以后,时代呼唤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当时的历史本身并没有提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足够成熟的条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和时代特点,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中国一步步走向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四,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其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看准了、认定了,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本逻辑相契合。由此,党的领导不可能无所不包,集中体现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等方面。在具体业务的操作方面,则需要更加强调市场导向。

把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制度是针对现实突出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而进行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些国有企业过于强调市场导向,忽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造成只顾眼前、局部和个体利益,而忽略长远、全局和整体利益,特别是淡忘了以社会生产力最大化为目标的根本责任。

今天,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为了避免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但并非退回无所不包的“老路”,而要围绕促进社会生产力最大化的这个“初心”,走出一条能将党的领导、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相互契合的“新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组织要发挥好政治核心与领导核心作用,就必然涉及党的领导与治理制度的融合问题。我们知道,公司治理制度源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目的是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司经营管理层以提升公司长期经营业绩为导向行事。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链条长,代理风险大,与公司治理制度相互匹配的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进一步影响到了公司治理制度的实际效果。

面对这一情形,通过建立党委前置讨论研究“三重一大”决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经营班子党员干部按照党委要求履职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制度,将党的领导全面嵌入公司治理制度,可以更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制度的原有目标,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强公司治理制度绩效。

可见,不论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始终坚持国家长远整体利益,还是为了解决公司治理制度所希望处理的委托代理困境,将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制度之中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于不同功能、资本类型和行业的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制度的具体形式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既要防止管得过细而降低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也要防止管得过粗而导致发展方向出现偏差。

总之,只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企业自身存在的历史唯物论意义,就可以说是好的制度安排。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新中国70周年”研究

从“老工业基地”到“国际化大都市”

方书生

70年来,上海一直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数“老工业基地”与“国际化大都市”等名片,代表了从赶超型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创新发展。上海经济成功跨越“计划”与“市场”并实现长期增长的密码之一,就在于形成了一种系统有效的创新功能和机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外部条件约束下,上海通过创新型资源配置,获得了显著增长。1949年至1978年,在有限度、低水平的经济开放条件下,上海形成了较有活力的“老工业基地”,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创新之路。

技术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从旧设备和技术的利用、群众性革新发展为跟进国家技术创新,扎实推进学习研究应用,组织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利用群众性运动进行劳动效率提高、群众性合理化技术革新建议以及政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技术进步,进而演化为科技驱动下的革新。由此,在政府主导的技术、组织或制度创新驱动下,上海成为当时全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中心。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上海开启了以创新引领为先导的经济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逐渐从工业中心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在这个进程中,制度改革与创新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进步与综合创新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原动力。

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逐步进入深化改革时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逐渐转向综合创新。一方面,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实施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努力建立以服务型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高新产业核心竞争力。

进入21世纪,全球的创新与发展呈现明显的变化,包括创新概念本身、创新主体之间关系以及创新对外在环境要求等方面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样的变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构想和举措,迫切需要从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去寻找问题与答案。由此来看,上海创新发展与创新引领的前后两个阶段,颇具案例价值和典型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本专栏文章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提供)